



陕西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杜甫农业诗研究

八世纪中国农事与生活之歌

〔日〕古川末喜 著

董璐 译

海外中国研究书系·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

主编 李浩 〔日〕松原朗

西北大学出版社

西北大学文学学科资助项目

杜甫农业诗研究

八世纪中国农事与生活之歌

〔日〕古川末喜 著
董璐 译

西北大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陕版出图字 25-2018-2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甫农业诗研究:八世纪中国农事与生活之歌 /
(日)古川末喜著;董璐译.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8. 10

(海外中国研究书系 / 李浩, 松原朗主编. 日本学
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

ISBN 978-7-5604-4267-9

I. ①杜… II. ①古… ②董… III. ①杜诗—诗歌研
究 IV. ①I207. 227. 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8296 号

本书由日本知泉书馆、古川末喜授权出版

杜甫农业诗研究:八世纪中国农事与生活之歌

作 者:〔日〕古川末喜 著 董璐 译

出版发行: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710069

电 话:029-88302590 88303593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 / 16

印 张:20. 25

字 数:311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04-4267-9

定 价:8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电话 029-88302966。

谨以此书献给以农为生的母亲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海外中国研究书系·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

主编 李浩 [日]松原朗

作者简介

古川末喜，日本佐贺大学文化教育学部教授。日本中国学会会员，中国诗文研究会会员，中唐文学协会会员。主要从事唐代文学思想与杜甫诗歌研究。代表著作有：《初唐的文学思想与韵律论》《杜甫农业诗研究——八世纪中国农事与生活之歌》。

译者简介

董璐，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学位在读，现任教于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日本古典文学、和汉比较文学、诗歌翻译。

《海外中国研究书系·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

学术顾问

〔日〕池田温 袁行霈 张岂之 王水照 莫砺锋 陈尚君 荣新江

组织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日〕松原朗 吴振磊

委 员 李 浩 马 来 张 萍 杨遇青 刘 杰 赵 杭 张渭涛
谷鹏飞

日方联络人 张渭涛

编辑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段建军

委 员 〔日〕松原朗 〔日〕妹尾达彦 〔日〕埋田重夫 〔日〕冈田充博
〔日〕石见清裕 〔日〕丸桥充拓 〔日〕古川末喜 〔日〕金子修一
段建军 谷鹏飞 高兵兵 张渭涛 刘建强 何惠昂 马若楠

主 编 李 浩 〔日〕松原朗

副主编 高兵兵

总序一

记得四年前,老友松原朗教授将其新著《晚唐诗之摇篮——张籍·姚合·贾岛论》的书稿转我,嘱我推荐给西北大学出版社,希望唐诗故乡的中国学人能及时读到这部新著,并能给予全面的学术批评。我充分理解松原兄的诚挚愿望,彼时恰好我还在校内外的学术管理部门兼一点服务性的工作,也想给学校出版社多介绍一些好作品,于是“怂恿”松原兄把原来的计划稍微扩大,从翻译出版一位日本学者的一部作品,扩展到集中推出一批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开始时,松原兄及其他日方学者并没有迅速回应,这其中既有对西北大学出版社和西北大学唐代文史研究团队的估量,也有对翻译力量、经费筹措等问题的担心。我很能理解朋友们的忧虑,毕竟,自我们与专修大学等日方学术机构和友朋合作以来,这是最大的一个项目。

出乎意料,等项目确定后,松原先生及其他相关作者表现出很高的学术热情和工作效率,他们自己和原书的日本出版方联系,主动放弃版权贸易中的版税,简化相关谈判手续,使得许多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最后商定第一批推出的是以下八部著作:

《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妹尾达彦著,高兵兵、郭雪妮、黄海静译)

《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金子修一著,徐璐、张子如译)

《唐代军事财政与礼制》(丸桥充拓著,张桦译)

《唐代的外交与墓志》(石见清裕著,王博译)

《杜甫农业诗研究——八世纪中国农事与生活之歌》(古川末喜著,董璐译)

《白居易研究——闲适的诗想》(埋田重夫著,王旭东译)

《晚唐诗之摇篮——张籍·姚合·贾岛论》(松原朗著,张渭涛译)

《唐代小说〈板桥三娘子〉考》(冈田充博著,独孤婵觉、吴月华译)

用中国学人的分类标准来看,前四部是属于史学类的,后四部是属于文学类的,第二部严格意义上说又不完全属于断代类的研究。故我们最初将丛书的名称模糊地称作“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也暗含对文史兼容实际的承认。最后确定为现在的名称,是因为在申报陕西省出版资金资助项目时使用了这个名称,故顺势以此命名。

依照松原先生的理解,他所选择并推荐给中国学界的是最能体现并代表当代日本学界富有日本特色的中国学研究成果,松原先生在与我几次邮件沟通中反复强调这一点,体现了他和他的日本同行的执着与认真,这一层意思松原兄在序中表达得更准确。当然,符合他这一标准的绝不止这八部著作,应该还有一大批,我熟悉的日本学界的许多朋友的著作也没有列入。按照初始计划,我们会与松原兄持续合作,推荐并翻译更多的日本中国学研究成果。

我们学界现在也开始倡导中国话语、中国风格和中国流派,看到日本同行已经捧出一系列能代表自己风格学派的成果,我们除了向他们表达学术敬意外,是否也应该省思自己的学术哲学和研究取向。毕竟,用自己的成果说话才是硬道理。

当下学术走出去的热情很高,而对境外学人相关研究成果的移译与介绍则稍显冷落。按照顾彬(Wolfgang Kubin, 1945—)的解释,文学走出去相当于到别人家做客,主动权在他不在我;文学请进来,让友人宾至如归,则主动权在我不在他。我们能做的事,能做好的事,应尽量做充分、做扎实、做精深。方以学术史,法显求法译经,玄奘团队述译,严复不仅以译著《群己权界论》传世,更奠定“信、达、雅”的译事三原则。近代以来,中国重新走向开放,走向世界,实与大规模翻译、引进、介绍海外新思想、新理论、新学说密不可分。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谦逊的说法,其实是我们主动拥抱马克思主义,主动引进现代科学,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其他世界学术名著。这一文明交往的基本史实在当下不该被有意遗忘、无意误读。身处其间,以温故知新、继往开来为己任的当代学人,不知该说些什么?又该做些什么?

本丛书的翻译团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原书作者推荐的,另一

部分是由出版社和高兵兵教授约请的。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著者与译者分处境内外,天各一方,联系和对接未必都畅通,理解和翻译的错误在所难免,出版后恳请各方贤达不吝赐教,以便我们逐步完善。其中高兵兵教授此前曾组织翻译过两辑“日本长安学研究丛书”,有组织能力,也有较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张渭涛副教授既是译者,又身兼日方著者和中方出版者的信使,青鸟殷勤,旅途劳动,多次利用返乡的机会,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

按照葛兆光教授等学者的解释,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由朝贡体制型塑的认知模式,而忽略甚至漠视从周边看中华的视角,好在现在大家已经认识到通观与圆照方可认识事物,包括认识我们文化的重要性。这样,翻译并介绍周边受到汉文化深刻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汉学研究成果,就有了三重意义:一是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周边地区的汉文化观,二是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勾画原典文化散布播迁的轨迹,三是丰富了相关专题研究的学术史。

当前,“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正如火如荼,其中最富启示性的思想,我以为是“文明互鉴”理论,即各种文化宜互学互鉴。学术成果的翻译介绍,就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设桥梁,充当使者。自古以来,我们的民族认为,架桥铺路于承担者是一种救赎的苦行,但于接受者则是一件无量的功德。对于中外文化的互译也应作如是观。

李 浩

2018年5月30日

于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寓所

总序二

日本的中国学,也就是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即便是将中国学之意仅限定为“中国古典文献的接受、解释、说明之学”,也已经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了。而且,日本处于中国历代王朝册封体制的外缘,始终与中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而能远离权威,相对自由。这使得日本的中国学,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近年,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性格。

在属于以往册封体制内的诸地域,是以忠实于中国文化、对其进行完全复制为价值标准的。而日本却不同,它对中国文化反而采取了选择性接受的方式,并积极对其加以改变。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日本的文字创制。平安时代(794—1192)初期,日本以汉字为基础创制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它们都是纯粹表音的文字,日本人从此确立了不借助汉语和汉字就能直接用日语表达的方法。相较于世界各地昙花一现的种种化石文字,日本独有的这种假名文字,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源氏物语》(约1008年成书)之所以能成为反映日本人审美价值观的决定性文学作品,就是因为它是使用平假名书写的。那么,如果从中国本位的角度看,无论是假名的创制,还是《源氏物语》的问世,都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脱离。也就是说,日本以脱离中国文化为反作用力,确立了自身文化的独特性。

日本虽然从广义上说是中国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的一员,却有独立的文化主张,而且日本人对此持肯定立场。这样的倾向并非始于明治维新后的近代,而是有着相当长的历史。近代以前的江户时代(1603—1867),虽然因江户幕府的政策,汉学(特别是朱子学)一度占据了学术主导地位,但在江户时代后期,由于国学(日本主义)和兰学(以荷兰语为媒介的西学)这两个强劲对手的崛起,汉学便失去了独尊之位。

但是,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日本人轻视中国文化。反而应该说,至少在20世纪初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日本人都一直在非常真挚地学习中国古

典,不仅解读文字,也解读其中的精神。日本知识界真正远离中国古典,是在二战结束以后。

福泽谕吉(1835—1901,庆应义塾大学创始人)被认为是一位致力于西学、倡导“脱亚”、堪称日本现代化精神支柱的思想家,然而他在十几岁不到二十岁的这段时期,却是一直在白石照山的私塾里攻读汉文典籍的。他在《福翁自传》里写道:

岂止《论语》《孟子》,我研习了所有经书的经义。特别是(白石)先生喜欢的《诗经》和《书经》,常得先生讲授。此外诸如《蒙求》《世说》《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等,也经常听讲,后又自学《史记》、两《汉书》《晋书》《五代史》《元明史略》等史书。我最为得意的是《左传》,大多数书生仅读完十五卷中的三四卷便会放弃,而我则通读全书,且共计复读了十一遍,有趣之处都能背诵出来。

应该说,福泽谕吉并非摒弃中国文化而选择了西方文化,他是以从中国古典中学到的见识与洞察力作为药捻,而后才得以大成其思想的。在当时包括福泽谕吉在内的日本知识界人士看来,中国古典并非一大堆死知识,而是他们从中汲取人生所需智慧的活的“古典”。就这样,日本文化一边尝试无限接近中国文化,一边又试图从中国文化中脱离,形成了具有双向动力的内部结构。

由中国文化或中国统治权威中脱离的倾向,甚至在处于日本中国学核心位置的儒学中也有发生。江户时代,幕府将朱子学尊为官学,这也反映了朱子学在明清两代的权威性。不过,江户时代的两位代表性儒学家伊藤仁斋(1627—1705)和荻生徂徕(1666—1728)却例外,他们两人,前者提倡“古义”,后者提倡“古文辞”,都还原了儒学的本来面目,超越朱子学成为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伊藤仁斋的《语孟字义》比戴震(1724—1777)《孟子字义疏证》的主张早了一个世纪。而荻生徂徕将道德思想从儒学中排除,认为圣人只是礼乐刑政等客观制度的设计者。荻生徂徕本来是出于对儒学的忠实,去探索儒学的真面目的,但结果几乎与儒学传统背道而驰。也就是说,荻生徂徕的儒学已经达到了非儒学的境地。荻生徂徕的这些主张,超越了儒学的界线,给当时整个思想领域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致使江户

后期的思想界,摆脱了朱子学的桎梏,并诱发了国学和兰学的兴起,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应该说,无须等待西方的冲击,近代日本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内部准备。

上文说过,日本文化的内部,具有一边尝试无限接近中国文化,一边又试图从中国文化中脱离的双向动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认识到,看似舍弃中国文化而选择了西学的福泽谕吉,以及原本乃是中国文化忠实者后来却成了一位破天荒思想家的获生徂徕,两位都是此种日本文化特征的体现者。

从宏观上看,日本属于中国文化圈,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因为从根本上说,日本受其地理条件所限,也不可能有机会与强大到足以与中国文化抗衡的其他先进文化发生接触。即便是印度的佛教,也是通过经中国文化过滤的汉译佛典,即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被接受的。但在这种状况下,日本没有被强大的中国文化同化,而得以贯彻其独自的文化体系,这几乎就是个奇迹。日本所处的特殊位置,与太阳引力作用下的地球不无相似之处。如果离太阳再近一些,就会像金星一样被灼热的太阳同化;而若是离太阳再远一些,就又会像火星那样成为一个冰冻的不毛之地。地球就是在趋向太阳的向心力与反方向的离心力的绝妙平衡之下,得以悬浮在太阳系中的一颗明珠。

如果以中国的视角重新审视的话,这样的日本文化反倒是显示中国文化普遍性及包容性的绝好例证,中国文化绝不是仅有忠实者顶礼膜拜、悉心呵护的单一僵死之物。日本的文化,从其具有脱离中国权威的反作用力这点来说,就算不是叛逆者,也无疑是个不忠者。但能够产出这样的不忠者,也是因为中国文化具备卓越的包容力与普遍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为了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将包括日本文化在内的多样性思考纳入视域,也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日本的中国学,绝非中国文化的忠实复制,也并不是像一个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初见新大陆般的、出于一片好奇心的结果。我们便是基于上述认识,想尽可能地提供一些新的见解和观点,所以策划了这套《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书目选择的主要原则,并不是仅以学术水平为准绳的,而是优先考虑了具备日本独特视角的研究成果。广大读者如果对我们

的主题设置、探讨方式等有一些微妙的不适应,我想说,那正是我们这套书的策划宗旨,希望大家理解这一点。此外,我还热切期待这套小小的丛书能为日中文化交流发挥出大大的作用。当然,也真诚期望得到各位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松原朗

2018年4月8日

代凡例

杜甫诗歌原文引自清朝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全五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1995年第4次印刷)。杜甫之诗题仅用括号标示。

诗题前四位数中,前两位大写汉字数字为仇注本(以下均简称为仇注本)之卷数,后两位阿拉伯数字表示此诗在该卷数内的排列顺序。

仇注本的编年方法批判性地继承了旧注本,大体上是妥当的。本书也基本沿用仇兆鳌的编年方法。因仇注本是按照诗歌的创作(及其背景)顺序进行排列的,只要读其卷数,就可知其创作时间和地点。另外,仇注本多被作为注释书和研究论著的底本使用,故此只要弄清楚一首诗在仇注本中的卷数以及在书中的排列顺序,便可方便地将之索引出来。

仇注本将各本中文字的异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标注,藉此便可一册在手,知晓其他各本的大体状况。由于诗歌中文字的异同既有单纯的误写,亦有因对诗句在解释上存在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如此一来,便大大拓展了杜诗注释的广度。当然,那些昔日难以读到的仇兆鳌文本,我们今日亦能容易读到了。

仇注本的注释极尽网罗和详细之能事。特别是杜甫使用的诗语,不仅收罗了杜甫以前各时代使用的例子,还详细追溯了这些诗语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尤其需要注意那些与诗歌并无多大关联,却是该诗语初次出现在古典韵文中的用例。仇兆鳌并非单纯想通过例子和字面上的意思来解释这些诗语。似乎这一点经常被大家误解,亦被认为是仇注本的一个缺点。仇兆鳌并非要说明这些词语的意思,而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展示这些词语的由来。

在详尽了解杜甫的基础上,仇兆鳌以一种全局式的视点对杜甫诗歌做

出解释,这一点是极为妥帖的。他那诗意连绵的文章,有时候甚至就是一首诗。仇注本引用古人的众多注释,给人一种集旧注之大成的感觉,甚至让人觉得关于杜甫诗歌的注释,只要仇注本一册在手,便可万般周全了。其实这样讲也不为过,甚至可以这么说,没有仇注本,亦会对我们理解杜甫的诗歌造成困难。另外,最近几年佐藤浩一就仇注本进行了极为详尽的研究。

杜甫的诗集大体完成于北宋中期,即十一世纪中叶,现存代表性的宋刊注本出现于这之后一百五六十年的南宋中期。

关于诗歌文字之异同和存疑之处,依据需要适当参照了以下宋代版本系统中的文本,此处仅列出未参照仇注本的诸家文献。

◎王洙(王琪)《(宋本)杜工部集》二十卷(及其补遗一卷) 张元济续古逸丛书使用的是1967年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另有王学泰先生较为简洁的校点本《杜工部集》(全二册,新世纪万有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卷末校勘记方便作为参考。

◎吴若本 作为吴若本的代用本,使用了《全唐诗》(扬州书局本)卷二一六至卷二三四。另有清代钱谦益《钱注杜诗》二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通过对照钱谦益本,认为吴若本在全唐诗本中亦有所反映。

◎赵次公本 使用了林继中先生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 使用了1971年台湾广文书局影印的古逸丛书所收覆麻沙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四十卷以及中文出版社影印的《杜工部草堂诗笺补遗》十卷。

◎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 虽然1985年由故宫博物院以景印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为题影印过,但本书使用了翻刻本的《杜诗引得》(《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特刊十四,1966年)以及四库全书本。

◎王十朋(假托之名)《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三十二卷 中文版本影印了黄永武主编的《杜诗丛刊》所收。

◎黄希、黄鹤父子《黄氏补注杜诗》三十六卷 原题为《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在本书中为方便起见,则使用了四库全书本。

◎另有无名氏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二十五卷 收录在四部丛刊初编中。

除以上列出的宋本系刊本之外,历代相关注释主要参照了以下作品。此处未列出的文献在正文中随文标注。另外,此处所列著作在正文中二次引用时只标注卷数,书名予以省略。

◎明代王嗣奭(1566—1648)《杜臆》(使用了曹树铭增校本,艺文印书馆印行,1971年)。

◎清代黄生(1622—?)《杜(工部)诗说》(中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另有其点校本,徐定祥点校《杜诗说》,黄山书社,1994年)。

◎清代浦起龙(1679—?)《读杜心解》(全三册,中华书局,1961年初版,1978年再版)。

◎清代杨伦(1747—1803)《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近代以后的传记以及译注主要参考了以下诸本:

◎陈贻焮《杜甫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8年)。

◎铃木虎雄《杜少陵诗集》(续国译汉文大成,国民文库刊行会,1928—1931年。使用了《杜甫全诗集》,日本图书中心,1978年再版)。

◎韩成武、张志民《杜甫诗全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张志烈主编《(今注本)杜诗全集》(天地出版社,1999年)。

◎李涛松、李翼云《全杜诗新译》(中国书店,2002年)。